

# 她往何處去？——中國 70 後小說中的 城鄉流動與女性命運

石曉楓\*

## 摘 要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持續進行中，完結時間也無法預料，其間所產生的文化滯差，論者早已提出種種觀察，而成長於此結構變遷承轉時期的一代，恰恰便是所謂中國 70 後。較早受到矚目的盛可以（1973-），新世紀初有長、短篇小說多部，刻畫了諸多不同行業的城市邊緣女性。而其他 70 後作家如魏微（1970-）、付秀瑩（1976-）、石一楓（1979-）等人，亦多有涉及由鄉入城女性生活書寫的作品。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以及中國農村空心化傾向，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出現在城市街頭，這一代作家如何展演當代版的「上城記」？本文試圖聯繫五四以來現代小說中的進城女性，探究城鄉流動問題在 70 後筆下的描寫與前代有何差異性？其承衍、發揚與差異之處何在？

關鍵詞：70 後、由鄉入城、戶口、邊緣、女性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 Where is She Going? Urban-Rural Movement and Women's Destiny in Chinese Post-70s Novels

Shih, Hsiao-F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ongoing, and it is unpredictable, the cultural lag that generated during the process has long been observed by the commentators, and the generation that grew up in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of structural change is precisely the so-called post-70s Chinese. Among them, Sheng Keyi (1973-) who received early attention, has a number of long and short stories portraying urban marginal women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Other writers born in the 1970s, such as Wei Wei (1970-), Fu Xiu Ying (1976-), Shi Yi Feng (1979-), also have works about women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With the rise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hollowing of country in China, millions of migrant workers appeared on the city's streets. How do the writers of the generation display the contemporary version of "Uptow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scri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mobility in the post-70s generation and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in relation to women who have come to cities in modern novels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order to show its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ces.

**Keywords:** Post-70s, Rural to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arginal, Female

# 她往何處去？——中國 70 後小說中的 城鄉流動與女性命運\*

石曉楓

## 一、前言：中國城鄉分化與 70 後成長背景

中共自 1949 年建政後，在毛澤東主導下，致力於建設以中國農民集體勞動力為骨幹的共產烏托邦。在中國現代化的設計與實踐方案中，「農村改革」與「戶籍制度」的影響層面尤其鉅大。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初期，當權者陸續推動了土地重劃、集體農場、大煉鋼、大躍進等一系列經濟改革，在農村浮誇的「放衛星」風氣中，導致長達三年的大飢荒。此段期間，由鄉村奔往城市的農民數量遽增，為制止「盲流」的遷徙，1958 年中國開始實施新住戶登記系統，除了傳統戶口系統要件外，還結合了蘇聯式嚴厲的「國內護照」<sup>1</sup>制度，目的在以土地農作支撐工業化進程的開展。而當局嚴厲控制人口的結果，則使得農民自此之後，除了從軍、提幹、招工、考學、婚姻等原因<sup>2</sup>之外，再無其他方法可以進城。

文化大革命結束前的近三十年裡，戶口系統確實發揮了極大效用，讓中國能以

---

\* 本論文為國科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國 70 後小說中的城鄉流動經驗——脈絡及其內容考察（Ⅲ）」（MOST 107-2410-H-003-088-MY3）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帝國、民國與黨國：文本、思想與意識形態的纏鬥」學術研討會（2021 年 12 月）發表，後經增補修改而成。承蒙學報匿名審查委員多方斧正，特此誌謝。

<sup>1</sup> 〔英〕唐米樂（Tom Miller）著，譚天譯：《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臺北：麥田出版，2014），頁 77。《低端中國》一書亦有戶口制度的相關敘述，參見〔美〕羅谷（Dexter Roberts）著，廖世德譯：《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新北：八旗文化，2021），頁 54-56。

<sup>2</sup> 丁帆主編：《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第一章「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頁 28。

低成本進行工業化；而城鄉結構的固着，則直至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為革除毛澤東的平均主義，推動了人民公社解體、歡迎外資兩項政策，方才得到鬆綁。一方面鄧小平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鼓勵農民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另一方面則以實驗性「經濟特區」形式，開放華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頭與廈門四埠，吸引第一波民工離村進城，造成了人口移動潮。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保守派內部有回歸的呼聲，李鵬及其支持者都認為中國經濟應回到過去封閉的控管狀態，鄧小平為此於1992年南巡，<sup>3</sup>鄉鎮企業與民工潮乃又重新興起，但城鄉差距也急遽拉大。2000年之後，雖有取消農業稅、戶籍制度改革、新農村建設等體制的調整，<sup>4</sup>但多為局部片面的修正，<sup>5</sup>實際上並未能解決城鄉差距的大問題。

王春光曾指出，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讓人感到最遲緩、最為艱巨的，便是城鄉結構的調整。城鄉結構不只是區域或空間關係，更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了身分性二元社會地位體系，它體現的是城鄉居民在基本權利、社會地位及資源享受等各方面的不平等與不合理。<sup>6</sup>關於此，王豐更深入分析1985-2000年間，中國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狀況，他以遼寧、四川、廣東三個省分為樣本，透過翔實的資料記錄，分析「類型」所造成的擴大性不平等，以及加速的結構性原因。王豐認為在中國既存的社會類型中，對塑造城市不平等起關鍵性作用的，包含所有制類型（ownership type）、行業（industry）、地域（locale）和工作組織（work organization）四大類型。他還特別強調地域性的「城鄉分割」，是中國進行社會主義試驗所留下最耀眼的遺產之一。為了推動工業化，政府在專斷地為農產品制定低價的同時，更為工業產品制定高價，從而創造出兩個社會，產生了兩種不同制度。

中國的城鄉差別表現在所有權結構、工作條件、收入和福利，以及生活機遇的

<sup>3</sup> [美]羅谷著，廖世德譯：《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頁59。

<sup>4</sup> 王春光：〈城鄉結構：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遲滯者〉，《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4：1（2007.3），頁48。

<sup>5</sup> 例如唐米樂便指出雖然中國政府在1990年代末期，開始將控制戶口的責任下放給地方政府，也啟動更為彈性的社會安全系統，但整體而言，受惠的還是少數城市而已。可參見[英]唐米樂著，譚天譯：《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頁80-93。

<sup>6</sup> 王春光：〈城鄉結構：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遲滯者〉，頁46。

差別。除了收入差距反映出城鄉不平等之外，舉凡糧食供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住房、生產資料供給、教育、就業、醫療、養老、勞動保險和保護、人事政策、徵兵、結婚和生育等，城鄉居民至少被 14 種制度所安排分割，而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機遇。換言之，城鄉二元分割早已不僅是地理、居注意義上的分界，更深入到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sup>7</sup>社會主義制度的吸引力，主要來自於它對經濟平等狀況做出的承諾，但「不平等」現今卻已成為社會動亂的導火線。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持續進行中，完結時間也無法預料，其間所產生的文化滯差、社會發展不均衡狀況以及思想觀念的差異性等，一如前述，論者早已提出種種觀察；而成長於此結構變遷承轉時期的一代，恰恰便是所謂中國 70 後。70 後被稱為「改革開放下的蛋」，普遍出生於鄉村、成長於小城鎮、生活於現代化都市，有論者指出其成長過程經歷了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時期的轉型中國，可謂是「身體在城市，精神在鄉村，靈魂在路上」的一代，<sup>8</sup>他們的鄉土經驗早已褪去了革命或知青、尋根經驗，也與前代作家經歷的文化裂變有所差異。整體而言，70 後出生一代的童年約當文革後期，處於貧乏的精神環境中；成長期則正逢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由計畫經濟逐步邁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社會價值和文化傾向也因此充滿了不穩定性。

相較於改革開放初起，農民往城市流動謀生的過程，以及葉落歸根的生活抉擇，70 後成長的背景，已是農民工再度遷徙的 1990 年代中期，他們與故鄉土地的連結不再如以往般根深蒂固，往城市遷移後所從事的工作，也不完全是過去的體力勞動活。在這一代作家筆下，城鄉居處抉擇的重心是否已有所偏移？城市謀生行當是否有所改變？凡此與精神性追求、價值觀的變化是否相關連？這些流動狀況又如何被表述？而本論文更感興趣的，尤其是作為城鄉遷移、流宕狀態中的女性，她們選擇的工作屬性、在城市的遭際、對鄉土的看法及心路歷程等，又有什麼變異？女性作

---

<sup>7</sup> 相關論述詳參王豐著，馬磊譯：《分割與分層：改革時期中國城市的不平等·第二章 不平等的類型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頁 22-41。

<sup>8</sup> 葉焯語。見夏琪報導：〈葉焯：當下中國需要一種「新鄉土寫作」〉，《中華讀書報》第 7 版，2015 年 8 月 26 日。

為邊緣中的邊緣族群，是否可能遭逢更多重的身體剝削？如果必須抵抗身體的被消費，還有什麼出路與可能性？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與社會背景考察下，70 後作家盛可以（1973-）的作品將成為一典型分析案例。盛可以是湖南益陽人，1994 年起定居深圳，2002 年開始發表小說作品，其文字冷峻、明快、鋒利，以觀察敏銳和語言風格猛烈著稱。盛可以的短篇小說如〈惜紅衣〉、〈淡黃柳〉、〈苦棗樹上的巢〉，長篇小說如《水乳》（2003）、《北妹》（2004）、《時間少女》<sup>9</sup>（2012）、《女傭手記》（2020）等，刻畫了諸多含括不同行業的城市邊緣女性，她們一般被稱為「北妹」。若從個人創作的時間軸觀察，也可以發現盛可以對於進城女性的關注視角，從早期《水乳》（2003）、《時間少女》（2012）（即《火宅》（2003））、《北妹》（2004）、〈淡黃柳〉（2005），到之後〈苦棗樹上的巢〉（2008）、《女傭手記》（2020）逐步轉變，包含了對第二代農民工（多以少女或適婚女性為主角）到第一波農民工（多以已婚或中年女性為主角）的關注轉移；從對城市罪惡的注目，回到鄉村出走潮所引發的家庭問題討論；從對自身與同齡人命運的關注，轉向更廣闊的前代處境觀察視野。由此可見盛可以對此問題關注的時間之長與視野之廣，允為當代書寫「進城女性」的代表作家。而其他 70 後作家如魏微（1970-）、付秀瑩（1976-）、石一楓（1979-）<sup>10</sup>等人涉及由鄉入城女性生活書寫的作

<sup>9</sup> 《時間少女》與盛可以的短篇〈二妞在春天〉（收入盛可以：《取暖運動》，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及另一部長篇《火宅》（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情節幾乎完全一樣，僅敘述有繁簡之分、人物名字多做改易，本文採取最後出版的《時間少女》版本。

<sup>10</sup> 在 70 後作家中，魏微是較早受到矚目的女性之一，她從 1994 年開始創作，但初期每與衛慧、棉棉等人並列，以性意識的大膽書寫著稱。21 世紀以後，70 後另一波特殊的代際經驗及狀態（即對城鄉書寫的關注），魏微亦並未缺席，〈大老鄭的女人〉曾於 2005 年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其他在「異鄉」框架下，對女性掙扎困境的書寫系列，亦頗受文壇關注。付秀瑩則於 2008 年才正式發表小說，以〈愛情到處流傳〉打響知名度，此篇曾獲首屆中國作家出版獎、首屆茅台盃小說選刊獎（2009），其後付秀瑩亦得獎無數。長篇《陌上》可視為其芳村書寫的總結；《他鄉》則開啟「入城女性」的觀察視角，付秀瑩多以傳統抒情筆法，書寫鄉村與進城女性的內在思維活動，風格婉約清新。石一楓早期以王朔風的成長書寫崛起於文壇，2014 年發表〈世間已無陳金芳〉後，創作開始備受關注，該篇小說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此後石一楓轉向關注社會問題與道德困境，屢有佳篇發表，孟繁華認為他提昇了新世紀以來社會問題小說的內容深度，並開啟當下中國文學的新方向。（見孟繁華：〈當下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從石一楓的小說創作看當下文學的新變〉，《文學評論》4（2017.7），頁 182。）總體說來，魏微、付秀瑩關於城鄉之間的題材書寫頗多，關注角度與情感態

品，亦將作為輔助分析文本，希望由此勾勒出 70 後作家筆下的城鄉流動狀態與女性命運，並與五四以來現代小說中的進城女性，進行縱向的比較。

## 二、以婚姻之名：分層制度與「鄉下人」的宿命

如前所述，中國的戶口制度是造成城鄉結構性不平等的關鍵所在，許多批判人士甚至稱之為「中國的種族隔離」，直指戶口系統是造成中國階層化最關鍵的基石。<sup>11</sup> 身為一名 21 歲即從湖南往深圳工作的創作者，盛可以在小說裡也刻畫了一群由鄉往（蘭溪）鎮，而希望落腳於城市的流宕女性。短篇〈淡黃柳〉<sup>12</sup>便是鄉村少女爭取由鄉入城過程的典型刻畫，天真少女桑桑厭倦鄉間的無聊與鄉裡妹身分，考上教師進修學校後，希望能較為輕鬆地跳出「農門」。但沒想到分發到羊角鄉教書，到頭來仍在門內，要調離還得靠嫁人。在離鄉出城的前提下，屈服於母親的勸阻：「愛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sup>13</sup>於是情人與作為愛情象徵的「淡黃柳」，也不得不因榮枯有時而顯露敗相。最後主角桑桑捨初戀情人而去，可說是在萬般無奈中嫁給了城市。

而在長篇《時間少女》裡，善良的鄉裡妹子西西，甚至尚不及走到城市，僅僅是沿溪出走，到鎮上便飽受了現實的摧折。西西原是墳地裡的棄嬰，從小在豬圈裡長大，失愛的她渴望離開家庭，到鎮裡生活，「鎮上的男人，臉上乾淨，衣服總像新的。還有他們的眼神，一副什麼事情都明白的樣子。」可是媒婆卻說「那些鎮裡人，沒

---

度都有各自的特殊性；而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允為進城女性書寫十分傑出的代表作，體現出一定的問題意識與對中國社會的銳利觀察，因此本文將此三位作家作品，與最關注「北妹」情境的盛可以並列討論，他們此類相關題材的作品，可說共同反映了新世紀以來中國愈發快速的城鄉流動與遷移狀態。

<sup>11</sup> [英] 唐米樂著，譚天譯：《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頁 65、78。

<sup>12</sup> 盛可以：《可以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頁 69-91。〈淡黃柳〉寫作時間為 2005 年。

<sup>13</sup> 盛可以：《可以書》，頁 84。

有哪個會娶鄉裡妹子。」<sup>14</sup>此言如同魔咒，主導了西西的下意識與青春。心高氣傲的西西，不甘於到了鎮上只能與殘疾人相親的命運，即使面對羅中國的追求，在考量到人品後，也覺得無法因他是鎮裡人而下嫁。然而當在益陽師範學校唸書的傅寒、在工廠裡上班的厲小旗與她有過感情又拋棄她時，西西也不免興起「我一個鄉下妹子，哪裡配得上你們鎮裡人」<sup>15</sup>的怨懟。甚至當厲小旗對西西的過去無法釋懷時，西西更無話可說，「她沒有說話的權利，或者她原本有，但是由於某些原因，便喪失了。」<sup>16</sup>這裡暗示的除了「鄉裡人」身分外，還包括女性身體的「毀壞」，墮胎女性如西西、失去清白的女性如桑桑，在婚姻與城市戶口的取得過程中已然失去了籌碼，淪為無產、無言也無權的底層。

而即使在都會中擁有謀生能力的職業婦女，對她們而言，「鄉下人」仍是如影隨形、無法撕去的身分標籤。盛可以另一部長篇《水乳》，描述一名來到深圳的新疆女子左伊娜，在婚姻中所受種種性別身分的遭際與對待。男友平頭前進是粵北人，工作和戶口都在深圳，作為一名 28 歲的政府公務員，他充滿了優越感，交往雖久卻從不考慮與左伊娜結婚，因為他深知女人在新疆的戶口難以調進，家庭結構會因此而成為日後生活的矛盾和隱患。直到為趕上單位分房的福利，平頭前進才協助女友去廣東 A 縣買戶口，再轉調深圳，「女人左伊娜覺得，她好像是他們將要變賣的一個女人。」<sup>17</sup>小說刻畫了左伊娜在婚姻中所受的種種不平等對待，她猶如做飯與做愛的工具，平頭前進由婚前吵架時「你想想你是什麼身分」的指責，到婚後「你不知道你有多窮嗎？」、「你有像樣的朋友？」之奚落，乃至於「多少條件比你好的，還在打工哪」<sup>18</sup>的譏諷，在所有白熱化的男女戰爭裡，只要提起身分問題，左伊娜便立即敗陣。

凡此對非城市戶口女性的看輕，在 70 後作家筆下比比皆是。相較於男性農民

<sup>14</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頁 5。

<sup>15</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247。

<sup>16</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241。

<sup>17</sup> 盛可以：《水乳》（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頁 23。

<sup>18</sup> 盛可以：《水乳》，頁 7、47、56、118。

工，這些小說展示、印證了中國社會學者的觀察：女性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所面臨的心理困擾，其實並非一般所以為的工作壓力，反而更多來自於個人情感方面的體驗。<sup>19</sup>箇中原因或許在於女性的身體無論在城在鄉，都更易直接被嫁接入市場交換條件中，在「求生存」前提下，性的付出、婚姻的屈就、尊嚴的喪失，或許都是工作之外必須承受的壓迫；也因此她們在情感的未來期待上，存在著更多的困惑與困境。

同樣由河北無極至北京工作發展的付秀瑩，則以長篇《他鄉》刻畫知識女性的城市生存困境。來自芳村，有學歷又有工作的教師翟小梨，年輕時曾因戶口問題，誤信了學生家長友人的承諾，率爾辭去教職轉往省政府工作。未料男方別有所圖，最後發現城市戶口的保證，無非是場騙局，自己還平白蒙受了妨害家庭的不白之冤。而學生家長在事件後的「語氣、腔調、神情，有了微妙的變化。微笑還是微笑著的，那笑容裡卻多了一種陌生的東西，調笑，戲謔，玩味，甚至，不恭。」<sup>20</sup>這就是鄉下出身女性在城裡所受到的各種冷待與錯待。

至於結婚之後，《他鄉》裡的知識女性更以細膩的心思，敏感覺察到公婆與大姑作為城市人，對於農村親家的傲慢，章家對翟小梨的親戚保持主動的區隔和冷淡，並在日常生活裡有意無意地維持城鄉的區隔與邊界。翟小梨自立自強，再度出外謀職，然而「這個城市，看上去是那麼溫和，明亮，歡樂。可是，為什麼就沒有一張笑臉，是給我的呢？」<sup>21</sup>過去對於付秀瑩作品的討論，論者多注目於其文風一貫的婉約，以及素材選擇的地域性位移，<sup>22</sup>即由《陌上》的農村和美景象，轉向《他鄉》的都市刻畫，以為其個人創作歷程的變遷。唯王秀濤指出《他鄉》藉由「翟小梨這樣

---

<sup>19</sup> 參見向華麗：〈女性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於湖北 3 市的調查〉，《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3：1（2013.1），頁 105；張蓓：〈女性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現象研究〉，《南京財經大學學報》155（2009.2），頁 104。

<sup>20</sup> 付秀瑩：《他鄉》（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頁 66。

<sup>21</sup> 付秀瑩：《他鄉》，頁 97。

<sup>22</sup> 例如劉濤：〈書寫人倫之正——付秀瑩論〉，《西湖》2012：6（2012.6），頁 104-107、李雲雷：〈「中國故事」的獨特魅力——付秀瑩小說創作論〉，《百家評論》2014：1（2014.2），頁 115-118，以及侯雅倩：《論付秀瑩小說的城鄉書寫》（遼寧：遼寧師範大學中國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21）諸文均可為代表。

一位農村女孩，大學畢業後在城市的奮鬥和掙扎者，充分展現了這一類群體所面臨的現實與精神的困境，他們比鄉下進城打工者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精神和情感的內在撕裂。」<sup>23</sup>這是知識階層與勞動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所面臨的不同困境，一側重於精神歧視之難堪，一則側重於肉體踐踏之描繪。凡此進城女性書寫的特殊性正在於：小說揭露了（城鄉）階級歧視，或許還高於性別歧視，這是中國社會內部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與價值判斷。

有社會研究者曾指出，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包括三個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或文化層面。其中第三層次屬於精神上的適應，反映著參與城市生活的深度，也唯有心理和文化層面適應，才說明流動人口已完全融入於城市。<sup>24</sup>但付秀瑩小說卻反映了殘酷的現實：即令其筆下由鄉入城的年輕知識女性，都無法完整融入一個城市的家庭生活中，可見城鄉社會結構內在的衝突，對於各階層鄉村女性在精神或肉體層面所造成的傷害，都是無可言喻的。

可以說，盛可以的《水乳》和付秀瑩的《他鄉》，更深刻地藉由家庭與愛情圖景，表現了婦女在社會結構衝突中所面臨的男女關係、城鄉身分等問題。付秀瑩言及創作動機時，曾語重心長地表示：「時代的力量是巨大的。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命運沉浮，除卻自身的努力，離不開巨大的時代語境的滲透和影響。翟小梨的成長歷程，也是中國經驗在這個時代積累和變化的歷程。個人與時代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正是《他鄉》致力於發掘和表達的。」<sup>25</sup>這裡引人深思的是，所謂「中國經驗」究竟是飛躍進步的榮光？抑或是榮光背後逐日加深的暗影？

這些由城至鄉女性所遭遇的時代問題，乃是社會分層所造成的結果，而類型則是社會分層的決定性因素。在此我擬以社會學者的觀察，更進一步印證上述小說圖景所展示的意義，王豐在其研究中曾指出，社會類型是以社會群體的樣態表現，群體對各種資源和社會機會擁有不平等的獲得和不平等分配的權力；換言之，他們自

<sup>23</sup> 王秀濤：〈情感的力量——讀付秀瑩長篇小說《他鄉》〉，《當代作家評論》2020：2（2020.3），頁61。

<sup>24</sup> 何曉紅：〈一個女性農民工的30年進城打工生活史——基於生命歷程理論研究的視角〉，《中國青年研究》5（2011.5），頁41。

<sup>25</sup> 鄭周明：〈付秀瑩：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都身在「他鄉」〉，《文學報》第3版，2019年8月15日。

然具有集體資源索取權，也需要藉由「劃清邊界」來定義身分，以分離內部人和外部人，因為邊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在社會建構過程中，起了集體身分認同、社會封閉及社會排斥的作用。<sup>26</sup>而戶口制度在中國社會所塑造的，便是「鄉下人」與「城裡人」的類型與邊界，從而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次等公民階級。上述小說所展現的，正是鄉下女性在這樣的時代衝突與變異裡，所遭逢的不合理對待、所產生的猶疑與惶惑。

而這些猶疑與惶惑背後所衍生的，又會是價值觀的錯亂與扭曲。《時間少女》裡的少女們在飽受「鄉裡戾」等謾罵之餘，以城市身分的確立作為力爭上游的目標。身為鄉下人的毛燕，得與鎮裡的理髮師傅論及婚嫁，她興沖沖也想幫西西介紹對象時，一方面不希望別人認為她是「降價處理」的貨，只能與跛子交往；另一方面又內化了鎮裡人的價值觀：「鎮裡一表人才的後生伢子，那個會要鄉裡妹子嘛！」<sup>27</sup>甚至在懷孕後更加「水漲船高，眼睛裡有點放不下西西這個人，擺出了某種鎮裡人的姿態。」<sup>28</sup>這些少女間的對話與友誼關係的變化，指陳了價值觀的逐步遷移，小說裡藉由米豆腐老闆娘對毛燕忘本的評論，明指出毛燕心態的改變。然而夸夸其談「鄉裡妹子怎麼了？……我當年還不是從鄉裡上來？」的老闆娘，自己嫁給鎮上人，卻希望兒子莫娶鄉下妹子，因為鄉裡人「要戶口沒戶口，要工作沒工作，真要結了婚，那日子怎麼過？」<sup>29</sup>甚至為了兒子傅寒的前途，最終讓西西蒙受墮胎而再無法生育的毒害。

至於被時代納入階層分類結構裡的西西，在「人往高處爬」的強烈渴求中，一方面羨慕毛燕，嫁了鎮裡人底氣足，另一方面又不願降格以求。雖然最終幾乎如願以償，接受了工人厲小旗的求婚，然而就在美夢即將成真之際，厲小旗的右臂卻被機器軋斷，西西「腦海裡有個聲音在盤旋，我要嫁的，仍然是一個殘疾人。為什麼，

---

<sup>26</sup> 王豐著，馬磊譯：《分割與分層：改革時期中國城市的不平等·第一章 從平等到不平等》，頁 12-14。

<sup>27</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59。

<sup>28</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171。

<sup>29</sup> 以上與米豆腐店老闆娘情節相關的引文，分見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139、28、113。

為什麼最終還是這樣？」「嫁給一個殘疾人，難免會被一些人嘲笑，但是，如果一個健康的丈夫忽然殘疾了，得到的會是同情與關懷。」「厲小旗斷了一條胳膊，西西嫁給他的揚眉吐氣與驕傲，也隨之折斷。」<sup>30</sup>少女的心思如此複雜幽微，顯見在鎮上一年所受羞辱與欺凌，更加深了她對成功的渴望，也加遽了價值觀的偏差與扭曲。

同樣地，《水乳》裡左伊娜對於婚姻、外遇對象的抉擇，也夾帶若干附加價值的衡量，「結婚還是帶點商業行為的東西」，<sup>31</sup>所以她在丈夫買的六棟小區和外遇對象為其訂下的湖心花園商品房之間考量；與吉姆郎格重逢，雖欣喜於重回初戀情人的懷抱，但想到對方戶口、工作關係都在新疆，又不如外遇對象工作穩定、關係良好，遂又打起退堂鼓。

身在城市的女性有種種考量，遠在鄉村的父母亦不免期待因女而貴，〈淡黃柳〉裡的母親對兒子與離婚女性交往不表反對，前提是對方乃「城裡人」；對於女兒的戀愛對象則充滿掌控欲，要求條件是城市戶口、在市裡工作，最好能將女兒調到市裡。最終得償宿願的母親「燙了捲髮，皮鞋黑亮，回鄉下必定一副十足的城裡人派頭，彷彿榮歸故里，言談間對莊稼與農事顯得生疏，像一個天生的城裡人。她甚至操起了市裡的話尾音，那個話尾音使她感到洋氣，顯示與鄉裡人的區別。」<sup>32</sup>《水乳》裡的新疆父親，對於女兒不告而嫁也並無苛責，反而認為在深圳安定下來也好。

即使知識分子如《他鄉》裡的翟小梨，與大學同學自由戀愛嫁到城裡，回到家鄉「鄰居來串門，說起我的婚事，大家都誇我有出息，好眼光，一找就找了個市裡的。」<sup>33</sup>她固然虛榮得緊，卻也清楚認知到自己其實是熱愛芳村的，唯這種熱愛只有在「外面」的時候，才會更加由衷地熱愛。<sup>34</sup>上述種種虛榮感的滋生、選擇的猶疑與價值觀的變化，都是社會分層制度下所導致的認同混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所造成人際關係、心理性格的差異化等，

<sup>30</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275-276。

<sup>31</sup> 盛可以：《水乳》，頁 205。

<sup>32</sup> 盛可以：《可以書·淡黃柳》，頁 85。

<sup>33</sup> 付秀瑩：《他鄉》，頁 87。

<sup>34</sup> 付秀瑩：《他鄉》，頁 33。

在這些小說裡，都有時代的印記與反映。創作者對於小說裡「鄉下女性」的角色與心態，有時以旁觀視角，展現出相當程度的同情；有時藉由內心涉入，進行深刻的自省；有時卻也在敘事間寄寓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與針砭。換言之，戶口制度是因，人心變異卻未必必然是果，女性若將未來一味寄託於婚姻，終究是毫無保障的妄想。

### 三、「築巢」抑或「逐潮」：城市的罪惡與誘惑

然則，在追求婚姻保障之外，農村女性是否可能開發出另外的自立途徑？盛可以的小說廣泛描繪了民工潮下農村出走女性的謀生過程。其中發表於 2008 年〈苦棗樹上的巢〉以及 2020 年新作《女傭手記》，便分別刻畫了第一波農民工由鄉入城的奮鬥歷程。

民工潮起因於 1979 年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政策，使勞動效率明顯提高，之後因發展工業大面積佔用耕地，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逐年增加，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現象也漸趨嚴重。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不少農村戶口開始外流，到沿海開發區和城市工業區找出路。根據統計，最早進城的農民，從事的職業主要為保姆、臨時工、工匠等，也有往返於城鄉之間的小商販。〈苦棗樹上的巢〉<sup>35</sup>裡的春香與麥根，便是第一波民工潮將起前進城謀生的夫妻，她們有民工的典型性格，亦即年輕、肯吃苦。但因丈夫過不慣城裡生活情願返鄉，夫妻因此分隔兩處，這也是許多民工家庭的典型狀態。

小說一方面寫妻子春香入城的虛榮動機、返鄉時的光榮感；另一方面亦寫丈夫麥根覺得在城裡像蟑螂，回村才有歸屬感的心情。而民工潮影響所及，因家庭分居最終導致情感破裂的事件，亦是本篇提示的農村問題，春香與麥根、三表嬸徐愛真與到惠州打工的三表叔之間的糾葛，便由於分居而產生。苦棗樹本是鄉間常見的卑賤植物，但樹上的巢早已是空巢，一如中國城鄉問題日益激烈化之後，所謂「空心

---

<sup>35</sup> 收入盛可以：《可以書》，頁 287-314。

村」的出現。民工們「逐」商品大「潮」的動機，原為返鄉「築巢」建屋，但人心終究敵不過環境的變異，《女傭手記》裡亦有名離鄉當保姆的李脆紅，她「離了婚，在街上做工，換過幾個男人，還帶過一個回鄉」。<sup>36</sup>這其間未及被探討的，甚至還有所謂「留守兒童」的問題。

城鄉人口流動，農村工作力大量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產階級化，指的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工作力的過程，而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面促成了這種分離，另一方面又使勞動者以僱傭形式與生產資料再度結合，<sup>37</sup>前述盛可以的長篇《女傭手記》，便刻畫了一群來到城市擔任保姆的勞動人口。街上的保姆群各自有各自離鄉的辛酸，小說敘事者李嫂當了 20 年保姆，她的冷眼觀察與評論，顯示了城市位階的差異性，例如傳聞因貪污或桃色緋聞而跳樓的黃局長，即使癱掉了地位還是比保姆高，原非底層所可接觸的大人物。鳳嫂與街上羅老頭鬧出的事件，則寫出另一種社會現象：鄉下人希望藉由保姆工作扯結婚證、取得戶口的用心，以及城裡人本能的排擠與輕蔑。城裡人睥睨鄉下人，認為空間地盤是他們的，然而街上的職業仲介所，根本以找工作為名行婚姻介紹之實，其他如買碼（六合彩）、吸收下線賣假酒、哄保姆買社保行貪污等等，種種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吃虧最多的就是沒有門路的老百姓。

在益陽街上的保姆們跨區域流動多年，儘管曾有過想留城的盼頭，但體認到世態炎涼，終究還是決定回歸可以安頓自我的農村，如〈苦棗樹上的巢〉裡的麥根，如《女傭手記》的敘事者李嫂夫婦。小說所呈現第一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可說經歷了一個從自我否定、打工到最後接受農民身分的「完整」迴圈歷程，<sup>38</sup>「離土不離

<sup>36</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頁 2。

<sup>37</sup> 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前言》（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頁 9。

<sup>38</sup> 此是與第二代更習慣於城市消費文化的農民工比較而言。盧暉臨、潘毅：〈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收入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頁 154。又，此處所謂的第一代，指的是 1960、70 年代出生，在 80、90 年代開始從農村到華南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地區工作者；第二代農民工則是指改革開放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後）出生和成長，並於世紀之交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打工者。見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頁 136。

鄉」的價值觀還是根深柢固。

但更年輕一輩的鄉村女性如錢小紅等，她們的情感體驗、身分認同則已漸漸產生質變。《北妹》裡的少女錢小紅和李思江到深圳打工，懷抱著賺錢開髮廊的夢想，少女們鋌而走險，從縣城招待所開始，便引來男性的垂涎，到了深圳之後，先是海上明珠夜總會的「三陪」歷險，再有詹士邦髮廊老板的試探，爾後少女們雖也遇過好人，但無論警察、賓館老闆或其他各色行業的男性們，最感興趣的還是少女身體。至於同性則對錢小紅保持警惕與戒備，她求職不順、謀職被解雇，往往導因於女性深怕丈夫被勾引，「沒一處正經」<sup>39</sup>成為預設的行為判斷。少女只能用童貞去換取暫住證（村長只幫處女辦證），由村一路往縣往城，由飯店、髮廊到夜總會，處處暗藏春色，少女們走到天涯海角，被看到的都是豐乳肥臀，所遇到的都是賣淫／準賣淫行業。曾有調查指出相較於老一輩的工地勞動，年輕民工較多在服務業、製造業工作，例如餐館女侍、清潔工等；而在髮廊與澡堂當按摩女的婦女，則絕大多數來自農村，<sup>40</sup>這是城市異鄉者的悲歌。

又有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傳媒所塑造的女性農民工多為刻板的勵志、受難或負面行為等偏差形象；在報導女性農民工受雇主虐待時，每每歸咎於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不懂法律、不夠自強自立，卻少有媒體挑戰造成其困境的文化和制度因素——父權制、群體排斥所造就的城市人優越感等。<sup>41</sup>由盛可以的《北妹》可見，她顯然血淋淋地揭露了女性在媒體刻板化類型塑造之下，更為真實的女性農民工生活實況。同時，結合前述短篇小說中桑桑、西西等少女的命運，更可看出身體作為女性的「資本」，相較於男性農民工，在小說中往往造成人物更為複雜多重的命運轉折。這也是付秀瑩等作家在對知識階層女性之刻畫中，較少著墨的部分。

一路看穿異性的覬覦，錢小紅在城市歷險卻堅決不賣淫，她也曾被介紹至玩具廠當女工，然而八人一房的宿舍生活、如機器人般的生產線工作及伙食欠佳的待遇等，呈現在錢小紅寫給父親的信中，歷歷是控訴。富士康蘋果生產線工人曾有詩：

<sup>39</sup> 盛可以：《北妹》（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頁 36。

<sup>40</sup> 〔英〕唐米樂著，譚天譯：《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頁 56-57。

<sup>41</sup> 張蓓：〈女性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現象研究〉，頁 104。

流水線帶走的不僅僅是 K93  
還帶走了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卻襯托不出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出了每一聲 OK  
卻喊不出我們內心的 FAIL／二十四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了 5S  
也照混了我們的白天黑夜  
千萬次的重複動作打造了完美機台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地旋轉  
卻轉不出我們想要的未來

這首〈在這裡〉<sup>42</sup>及其他盛極一時的打工文學，與《北妹》裡所陳述的生產線生活，共同體現了中國作為全球最大「世界工廠」背後的工人辛酸。根據 2000 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數量接近九千萬，凡此均導因於農村的去集體化改革，以及戶口限制放寬所造成的移工潮。學者將當代中國工廠大量使用外來農民工，並利用工廠宿舍對工人進行暫時性安置，以此來承擔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用工型態，概念化為「宿舍勞動體制」，在此體制中雇方可方便進行空間規訓，以對短期、臨時性、大規模跨地區流動，廉價而年輕的外來工（特別是女性）加以使用，並將其工作日的勞動產出最大化。<sup>43</sup>凡此展示了前述「行業」類型分層以強制權力進行公共壓榨，並依靠社會優勢地位獲得利益的不平等現象。工廠一方面藉由「宿舍勞動體制」的全面控制，保證最大生產力，另一方面又藉由罰款、扣證件等方式抑制並苛扣工資，《北妹》裡的錢小紅因不足月辭工而無薪資的經歷，便是不對等契約的典型剝削；而又因農民工流動性強，自然也不易凝聚抗爭力，以為自身爭取權益。

除了工廠、宿舍對人身所造成的雙重勞動異化之外，年輕女性還需面臨性的交

<sup>42</sup> 此為富士康工人仁興等的創作，轉引自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前言》，頁 5-6。

<sup>43</sup> 任焰、潘毅：〈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收入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頁 161-164。

換與身體剝削。《北妹》寫工廠裡的拉長（生產線主管）「就是一拉就長，拉，拉褲子拉鍊，長就是上升」，<sup>44</sup>暗示女性升職得靠情色服務而得；又如《水乳》裡的左伊娜為工作、為銀行指標，分行領導來巡時同樣得加班「三陪」，<sup>45</sup>凡此都指陳了生活於女性是多麼艱難的奮鬥，那是勞力與性的雙重剝削。

深圳作為 1980 年代的經濟特區，早已是所謂「巨型城市」(megacity)，也是民工之鄉，盛可以赤裸裸道出「這個閉塞久遠的窮漁村人，因為猛然的開放與新生事物的突然湧入，腰包裡鼓囊後，把獵艷與品嚐『北妹』（廣東以北的女孩子）當成了人生的娛樂休閒，甚至生活志趣」<sup>46</sup>的現象，舉凡《水乳》裡笑稱男性對家庭按時「繳公糧」是可悲的深圳文化，以及《北妹》裡「握住男人命根子便是握住錢」的粗俗推論，都反向驗證了城市的墮落與敗壞。浮華之風侵蝕了少女的夢想，《時間少女》裡林海洋往來於蘭溪鎮和益陽市之間，機帆船的移動，彷彿代替少女們去看夢想的眼睛，「老板娘說到縣城的衣服時，好像她已經把整個縣城都穿在身上」，<sup>47</sup>但西西最後唯一進益陽城的經驗，竟是為了墮胎。〈惜紅衣〉<sup>48</sup>裡賣手機的成都妹子董葡萄，為了讓弟弟上高中，而輟學往廣州打工，父親交代務須在城裡給他謀個差事，董葡萄自忖與總經理客戶「必要時可以上床」，但一群中年男人將年輕妹子玩弄於股掌之間，品味了她的身體，卻遲遲不願給出為人謀職的承諾。

進城女性如何抵抗身體的被消費，她們究竟還有什麼出路與可能性？葛蘭西認為一個階級總是配合著政治經濟霸權來行使文化霸權，而文化特權的存在乃是文化霸權的一環。<sup>49</sup>這批年輕農村女性希望成為城市人，過上現代消費者的生活，她們對城裡人生活作為的模仿（如〈淡黃柳〉、〈苦棗樹上的巢〉所描繪）、口音的學習（如

<sup>44</sup> 盛可以：《北妹》，頁 92。

<sup>45</sup> 盛可以：《水乳》，頁 53-55。

<sup>46</sup> 盛可以：《北妹》，頁 120。

<sup>47</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28。

<sup>48</sup> 收入盛可以：《可以書》，頁 223-243。

<sup>49</sup> Antonio Gramsci, "Men or Machines?" in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ed. David Forga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62-63. 本文主要是藉由學校教育政策講述文化霸權的概念，關於葛蘭西的階級霸權說，另可參看陳昭瑛：〈霸權與典律：葛蘭西的文化理論〉，《中外文學》21：2（1992.7），頁 54-92。

《北妹》、徐則臣〈我們在北京相遇〉<sup>50</sup>所呈現)，都是語言霸權，亦即文化霸權在其間產生作用，充滿了階級宰制的暗示。葛蘭西並且相信在農工階級中保持大量的文盲人口乃是一項政策，目的為強化階級區分。<sup>51</sup>中國鄉間學校的闕如、農民受教機會的被剝奪，某種程度上符應了此種判斷。而在盛可以的小說裡，我們也看到對生活有憧憬與夢的北妹們，希望藉由知識的獲得改變生活處境，警員朱大常鼓勵錢小紅讀書，小紅充滿鬥志地呼喚同伴「思江耶，我們都只能靠自己噠！」警員廖正虎也正言鼓勵少女「把青春投入到工作和學習中，生活會給你回報的。」<sup>52</sup>但生活並沒有給予這類生活在底層的女性任何回報，資本的經濟邏輯與國家的政治邏輯，將原有的戶籍制度與新的勞動力控制體系結合，建構出一套更嚴密的權力型態，將弱勢邊緣人劃定於城市的邊界，持續再生產出種種不平等，她們對生活無法有任何特別的追尋，因為「活下去」<sup>53</sup>本身已是奢求。

#### 四、我要活下去：女性多重邊緣身分的焦慮與突圍

學者曾考察新世紀以來大部分農民工書寫的作品，指出「城市物質現代性的想像，是農民入城的基本驅動力，而鄉村的精神想像，是農民在城市存在精神支柱」，<sup>54</sup>誠然，50 後、60 後作家如劉慶邦（1951-）、羅偉章（1967-）等人的小說中所描述者，

---

<sup>50</sup> 〈我們在北京相遇〉（收入徐則臣：《啊，北京》，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裡提到女性沙袖，一口東北話造成其與城市的隔閡，在書店裡工作被批評、上市場買菜被提價、連公交車售票員聽到外地口音「就把你歸入民工行列，問路都愛理不理的。」關於語言與階層關係的相關分析，可參石曉楓：〈假做真時：徐則臣北京系列小說中的偽證／偽貨販售者〉，中國《文藝報》第9版，2017年5月17日。

<sup>51</sup> Antonio Gramsci, "Types of Periodical: The Final Evolutionary Being," i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ed. David Forgacs,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trans. William Boelhowe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402.

<sup>52</sup> 以上兩段引文見盛可以：《北妹》，頁81、153。

<sup>53</sup> 《北妹》的原題便是《活下去》，見盛可以：《北妹·再版後記》，頁280。

<sup>54</sup> 江臘生：《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82。

多為鄉村破敗、農民不得不出城謀生的悲哀，在他們筆下，農民仍心繫於自己的土地，鄉土因此成為桃花源式的精神皈依。但在 70 後作家筆下，故鄉又以何種面目呈現呢？盛可以的《女傭手記》裡，出城多年、已屆中年的李嫂自述「到益陽街上住了十幾年，一直不踏實，不像在鄉下，住在自己家裡，曉得這是屬於自己的地方。有些人講這就是漂泊感」，<sup>55</sup>幫傭們雖還有著返鄉種田的念頭，但也開始產生去留的猶疑，因為城市裡的生活自由，而鄉裡口舌是非多，個人難有私密空間。李嫂自己也為是否遷出農村戶口而為難。在小說中，盛可以以較為冷靜的觀察，寫出了女性在城鄉文化衝突下價值取向的多重考量，相較於田園牧歌式的城鄉表面對照，或男性老李認定「遷出來，宅基地沒有了，田沒有了，死了都沒地方埋」<sup>56</sup>的死心眼，其筆下出城多年的女性，價值觀的鬆動、流衍與變化已可隱約展現，〈苦棗樹上的巢〉中夫妻對城市生活適應性的差異，自然又是另一顯例。

至於少女們初長成後的跨省流動、職業類別，以及入城不回村的種種抉擇變異就更明顯了。除了虛榮心、好奇心的驅使之外，在小說裡我們還能看到當《時間少女》裡的西西遭受鎮民不合理對待及流言的種種打擊時，「她知道自己，或者有一天會離開小鎮，但肯定不是回家。」<sup>57</sup>因為鄉土對於女性的種種壓迫，包含了家庭的不善待，如〈淡黃柳〉裡桑桑母親對其身體的嚴格控管與檢查、《時間少女》裡西西母兄的認錢不認人、《北妹》裡被姊夫誘姦的錢小紅等。也包含了村民懷疑的眼光，〈苦棗樹上的巢〉裡村民流傳著春香在城裡做的勾當，《女傭手記》裡但凡到街上工作的女性，回鄉時「每個女人都被懷疑過（站街、拉皮條），尤其是紋眉毛、畫眼眶的。」<sup>58</sup>《北妹》中錢小紅與李思江返回農村後，鄉民對她們的職業、服飾、賺錢方式等也充滿猜疑，兒時玩伴躲得遠遠的，錢小紅姊夫對她的精神凌辱與肉體覬覦較前更甚，李思江的父親則給了她狠狠的耳光和最羞辱的咒罵。

顯然，女性身體的經濟價值不但在城裡被剝削，回鄉亦受到耳語的精神壓迫，

<sup>55</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75。

<sup>56</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183。

<sup>57</sup> 盛可以：《時間少女》，頁 259。

<sup>58</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23。

然則農村女性出城後，為何會被認為、或必然從事特定行業？魏微的〈回家〉，講述了一則以表姐為首，帶領小鳳等少女在丹陽街做肉體生意的髮廊妹，因掃黃而被員警押解回鄉的故事。小鳳長於貧窮落後的農村，高中畢業跟著表姐進城打工，到了丹陽街，才知道表姐是幹什麼的。小說描寫小鳳初始不從，她了解到初出農村的少女們有很多營生方式（碼頭苦力、踩三輪車、要飯等），她也付出過努力（求職卻受騙），有一些憧憬（希望能碰上年輕小職員），最後卻還是只能回到丹陽街，因為賣身賺錢最快。

在王豐所調查的分割與分層網絡中，確實發現「性別不平等」橫跨地理邊界，滲透入社會各個領域，對於女性的性別歧視，構成了中國社會分層秩序中的核心原則，而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受到歧視，賣淫、犯罪的比例也不斷增加，<sup>59</sup>凡此都有相關數據證明。〈回家〉裡的翠兒、阿芳等人為了生計而下海，返鄉卻只能蒙受羞辱，所以在掃黃行動中寧可坐牢也不回家。而遣返過程裡，歷經城市實習記者、故鄉村民的鄙夷後，小鳳終究在母親暗示下離家，並帶走李霞。此一結尾暗示了鄉村女性命運的重複與輪迴。還鄉之旅的最後姿態，也只能是離開，這就是進城女性否定性的城鄉體驗與精神漂泊，在繁華炫惑和歸園田居之間，她們都成為他者，離與返遂成為兩難的抉擇。

家庭生計所需之外，還有滿懷憧憬與懷抱者如魏微〈異鄉〉裡的子慧，她出生、成長於小城吉安，中師畢業後順理成章地當了小學教師，生活平靜安穩，有一天卻心血來潮，辭了職選擇北漂。在北京她努力取得更高的學歷，找到會計師工作，也憧憬著與城裡人戀愛，說不定可以留城或出國。「這二十年來，正是大量中國人熱衷離開的年代。」<sup>60</sup>「中國整個瘋了，每個人都在做著白日夢。」<sup>60</sup>在異鄉生活得委屈的子慧，必須面對房東太太租房子前的盤問，還得承受母親來自遠方的電話監視，責問她是否和農民工住在一起？是否房裡有男人？返鄉之後，父母更搜查她的行李，鄉人、家人都懷疑她在城裡當妓女。小說對於還鄉心理的刻畫十分幽微而複雜，一

<sup>59</sup> 王豐著，馬磊譯：《分割與分層：改革時期中國城市的不平等·第四章 擴大的不平等：類型》，頁109-111。

<sup>60</sup> 魏微：《姐姐和弟弟·異鄉》（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頁75。

方面寫子慧偽裝成外地人口音，輕視自己家鄉的心態；一方面寫子慧眼中所見鄉土的種種建設與變化，變動中的中國讓故鄉直如異鄉，再也回不去過往的純樸；更甚者，小說寫鄉人與家人對子慧的懷疑，論者以為：

〈異鄉〉裡的故土化為了對女性私密世界的狠狠「窺視」……當子慧筋疲力竭地回到故鄉，當子慧的父母從皮箱中搜出女兒的胸罩內褲和睡裙，檢查上面是否有污點時，故鄉／傳統終於以一種尖銳的形式「硌」進了女性敘事的肌體。胸罩等內衣指向女性的隱私和身體，它們暴露在鄉村的窺視下，故鄉由此「男性化」了。<sup>61</sup>

這是以男權／民間話語遂行社會歧視，從而讓女性失語、沉默，讓女性失去主體性的鄉村。針對魏微此一類型作品，中國學者多由農民進城後與城市、鄉村「雙重疏離」的異鄉人處境出發，批判由此引發的文明與墮落課題。<sup>62</sup>然而藉由敘述視角的差異，指出女性作為返鄉者更為窘迫的存在，我以為才是更為重要且更基本的問題所在，魏微在小說裡不憚其煩地重演女性返鄉受到歧視、懷疑與異樣眼光的遭際，顯見這是普遍存在的實相反映。然則在地域與性別雙重邊緣的處境下，女性何去何從？她們是否可能回到城市繼續艱難的生活轉向？顯然是小說無法提供解答的問題。

從故鄉出走後，這些女性幾乎已離土失根，她們成為城市定居者的渴望更加迫切。《女傭手記》裡的毛小花受過大學教育，為營救兄長而與男友分手，跟了錢老闆，但一旦發生感情，便執意不回故鄉，因為毛小花被鄉裡人傳言劈腿，又說她當闊太太忘了本，看不起鄉裡人，<sup>63</sup>這種「回不去了」的矛盾，導致小花最後在被背叛的痛苦中跳樓自殺。《野蠻生長》<sup>64</sup>裡離鄉出城的第三代子孫劉一花從十樓墜下、劉一草則因提出分手被男友胡禮來分屍，這是盛可以殘酷譜出的女性悲歌。

<sup>61</sup> 李丹夢：〈文學「返鄉」之路——魏微論〉，《山花》2008：1（2008.1），頁149。

<sup>62</sup> 例如吳聖剛：〈文明與墮落——關於魏微〈異鄉〉所引發的問題〉，《名作欣賞》2006：9（2006.5），頁47-61、呂濤亞：〈都是異鄉人〉，《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9（2009.9），頁65、付明根：〈雙重疏離：從〈異鄉〉看當代返鄉的精神歷程〉，《文藝評論》2012：1（2012.1），頁98-102 諸文均然。

<sup>63</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98。

<sup>64</sup> 盛可以：《野蠻生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頁265-268。

無論中年婦女或出城少女，人人背後都有無奈與辛酸。《女傭手記》裡的保姆李嫂，深知家政圈乃是非之地，但她體諒其他保姆「掙的錢不是給自己吃喝玩樂，不是為自己」，<sup>65</sup>所以格外憐恤她們。小說裡的鳳嫂一心要找個城裡人扯結婚證，但賀老頭、裴主席都只是睡睡妥妥，還嫌棄「你們鄉裡人，有一種不好，就是不愛乾淨，邋邋。」<sup>66</sup>謝嫂 17 歲到街上與小伙子發生關係，但情人嫌他是鄉裡戶口不要她。愛嫂男人殘廢、兒子溺死，出城工作又為賭博所累。鄧嫂男人偷腥，無奈出城工作後，公婆還到城裡跟她要錢。眾人縱有若干不堪往事，但在求生存的前提下，也只能繼續街上的保姆工作。小說寫到煞尾十分動情，李嫂從旁觀敘事者一轉為自抒己懷：

走在街上，窗玻璃照見人影，我看見自己的樣子，有點難過，頭髮白了一半，不曉得什麼時候白的。這麼多年我沒認真照過鏡子，沒仔細梳過頭髮，沒收拾打扮過，也沒好好耍過一天……就這樣老了。<sup>67</sup>

即使不生事、無有妄想的李嫂，也就這樣老了。盛可以描繪底層女性的生活與感受，並非以俯視的態度去評斷、去憐憫，而是如實展現出現代性社會遷移中農民進城生活的實相。

《北妹》則是其早期另一部生活肌理豐實的小說。在錢小紅之外，盛可以寫出了李思江的貧窮與失學、失貞與失愛。李思江與錢小紅一起離鄉出城，先後遭村長奪去童貞、夜總會強暴事件，至髮廊後得識阿坤，自學期間得識吳承軍，她懷了孕卻因農民掉包誤抓而被結紮，「活的人，比牲口還賤。即使是騙一頭豬，也得看看這頭豬是否到了該騙的時候，李思江才十九歲，就像頭豬一樣被閹了。」<sup>68</sup>但李思江用身體換來的賠償費，最後又被男友取走，遂絕望而尋死，那當下錢小紅一句「思江耶，我對不起你，不該喊你來深圳」，<sup>69</sup>道盡了多少北妹的心酸。

錢小紅與李思江的冒險歷程，帶出更多底層女性在城市討生活的宿命與無奈。

<sup>65</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64。

<sup>66</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24。

<sup>67</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237。

<sup>68</sup> 盛可以：《北妹》，頁 239。

<sup>69</sup> 盛可以：《北妹》，頁 278。

酒店服務員黃杏因家境貧窮而失學為咨客，結識男友卻因結婚條件不成熟而打胎。張為美捲款潛逃，只為買到深圳綠卡好結婚，最後為生活所逼而淪為代理孕母。吳櫻的先生為工廠主管卻與女人有染，她忍氣吞聲帶著 3 歲兒子住在環境品質極差的胡同裡。農民、女性與弱勢者的標籤，多重構成這批人物的底層身分，她們從一個工作轉換到另一個工作，卻永遠無法改變身分，取得進城資格，即使她們已先決性地渴望離鄉。而另一方面，她們也失去了回頭的自由，地域、性別、工作類型等增長了貧富與身分差距，諸種結構性限制令她們無法真正解放，只能在城市流宕的歷程中不斷被異化。

在結構性分層裡，女性還是要尋求突圍的可能性。她們首先要求的是平等被看待。付秀瑩《他鄉》裡的翟小梨，即使有了教職與戶口，婚後始終對抗著夫家歧視鄉裡人的眼光。盛可以《水乳》中的左伊娜是有薪階級的現代女性，而她卻只能在外遇對象身上，享受到性的主動與歡愉；她選擇外遇對象的原因，部分在於莊嚴帶她回老母親家吃飯，「她感覺身價和地位，在這個餐桌上非常突出」，「她不是一個他隨便帶回家，隨便過一次性生活的女人，不是商場買回來的一次性用品。」<sup>70</sup>這種尊嚴的感受與爭取，即使在益陽街上工作的保姆，都慎重表態：「雖是做保姆，人格上還是平等的，這是我對東家唯一的要求。」<sup>71</sup>李嫂旁觀生活群像，雖然鳳嫂終究被騙財（投保被詐）騙色（談感情被辜負），但「我很佩服鳳嫂，錢也好，感情也好，去了就去了，哭完罵完，重新開始，沒什麼可以打垮她。」<sup>72</sup>盛可以此部小說以平白如話的敘述，模擬底層保姆語調，講述人在生活中的韌性，自有平凡動人的力量。

而論及表現底層女性生命力最成功的角色，首推《北妹》裡的錢小紅，這是名帶點無畏無知，一路往前奔跑的女性。錢小紅在由鄉入城所歷的世事裡，清醒認知到「處女膜除了跟愛情沒關係，與所有的事情有染」，她的情欲需求建立在自主意識上，而非以賣淫求生存為前提。她的直率表現在對警察朱大常、黑道陳志穎的欲求上，因為朱大常對她真心疼惜、陳志穎灑脫明快。她的善良表現在對馬小明沒有激

---

<sup>70</sup> 盛可以：《水乳》，頁 107。

<sup>71</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9。

<sup>72</sup> 盛可以：《女傭手記》，頁 235。

情，卻能以母性的胸懷寬容、接納他的「演習」。她的有所為、有所不為，表現在相對於警員廖正虎一時憐憫，想使自己偉大起來的虛偽心態，她直指出「情欲不是骯髒的，交易才是可恥的」，「我們都滿足了自己的身體」的真相。而在面對官員 S 小心翼翼地想買春的行徑時，錢小紅淋漓痛快地玩弄了他一番，並不無揶揄地直言「他在羞辱所有女性，他以為操著雞巴就操縱權力，他以為人民幣就是他的雞巴，可他的雞巴偏不是堅挺的人民幣。」在一路挺進城市的過程裡，錢小紅收拾了旅館潘經理、排除了院長雷一剛等人的覬覦；錢小紅欣賞成都女孩朱麗野性開放的態度，也鼓勵同事吳櫻反擊丈夫的不貞與不負責任。凡此以身體享樂、以身體進行反抗的意念，在錢小紅此一人物身上，純係憑藉直覺為之。曹霞曾指出「將『身體』還原至『身體』的本然形態是獨屬於盛氏的寫作邏輯」，<sup>73</sup>而這也是盛可以小說裡底層女性對應城市困境的爽直態度。盛可以且刻意以粗礪不求精緻的語言風格為之，更強化了讀者內在的心理衝擊，也激發底層女性受眾對錢小紅此一角色更深的認同感。錢小紅的身體本能與求生本能並存，那種野蠻生長的力量，可謂由土地裡勃然煥發。

然而進城的錢小紅終究沒有得到愛情、金錢與婚姻，她最後因乳腺增生，乳房不斷腫脹變大，小說收束於錢小紅「咬著牙，低著頭，拖著兩袋泥沙一樣的乳房，爬出了腳的包圍圈，爬下了天橋，爬進了擁擠的街道。」<sup>74</sup>送別失意自殺的李思江返鄉後，錢小紅選擇帶著這雙曾經給她歡樂也給她痛苦的乳房，繼續留在城市。關於這個結局，論者多認為帶有悲觀性指涉，如：

乳房，這個開篇即「被看」的尤物！曾給她帶來同性的妒忌和異性的覬覦，最後病態發展，成了遭主體厭棄的「泥沙」，彷彿包含著錢小紅對自我的仇恨，又宛若對男權的幡然醒悟。<sup>75</sup>

錢小紅以自己的身體去對抗龐大的男權文化，是勢單力薄的，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她無力扭轉乾坤，失敗是必然的結局。<sup>76</sup>

<sup>73</sup> 曹霞：〈閃電在深淵裡的舞蹈——盛可以論〉，《藝術廣角》2019：6（2019.11），頁72。

<sup>74</sup> 盛可以：《北妹》，頁279。

<sup>75</sup> 申霞艷：〈誘惑的天賦——盛可以論〉，《文藝爭鳴》2018：6（2018.6），頁136。

<sup>76</sup> 周婷：〈盛可以以「冒犯之筆」穿越生活的殘酷真相〉，《短篇小說（原創版）》，2014：14（2014.5），

小說結尾，象徵著身體自由的乳房最終拖垮了錢小紅，……身體自由本是突破男權的利器 and 目的，卻給女性帶來了新的失落和焦慮，甚至將女性放置到了更為被動的處境：女性倡導的身體自由，在男權的圍觀中變成了某種鬧劇，又被男權所利用，反戈成打垮自己的利器。<sup>77</sup>

《北妹》為盛可以最廣被討論的成名作，中國學者多對其小說中的性別問題甚感興趣，有些甚至將其作品中的女性愛欲視為一種「疾病敘事」來討論。<sup>78</sup>然而小說家給予筆下人物這樣的下場，究竟有何意義？我以為錢小紅最後所罹患的「巨乳症」，除了主體厭棄的討論方向外，應有其他更具力量的指涉性意圖。

先引盛可以之言以明其創作觀，她曾經多次強調，小說需要冒犯的力量：

當小說以某種非理性的形態、非溫和的方式展現人性的本來面目，自然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因素和社會規範所不能容忍。但是，這些東西深深紮根於人類原始生命的本能之中。小說家對惡的探索與思考，是內心能量的巨大噴發，是對於藝術的神聖冒犯。<sup>79</sup>

什麼是對惡的探索與思考？它在挑戰讀者什麼樣的道德底線？如果將巨乳病變視為肉身對女性的自體性反噬，反而可能使小說成為道德訓誡的傳聲筒。實際上一如《北妹》裡所展示，生活對這群女性而言，「表面上平靜與簡單，實質上充滿了複雜的鬥爭與喧嘩」，<sup>80</sup>錢小紅以豐乳肥臀的性徵追逐著身體歡樂，也憑一己之力與生活進行直面的肉搏。但她並不像李思江般，希望利用身體去換取都市的生存資本，在與都市短兵相接的戰鬥中，她的言語與行事風格「有對虛妄生活的洞察和對自身欲望的尊重」，<sup>81</sup>她天然甚至天真地釋放著身體的能量。正是在錢小紅這個人物身上，我們

---

頁 32。

<sup>77</sup> 馬玲麗：〈身體自由：欲望與反抗的雙重沉淪——以盛可以的《北妹》為例反觀當下底層女性文學寫作〉，《名作欣賞》2010：15（2010.5），頁 35。

<sup>78</sup> 如周婷：〈新世紀女性寫作的異質性——盛可以小說創作〉，《小說評論》2013：S2（2013.10），頁 38-40、荊瑩瑩：〈雙重人格意識下的女性主義敘述聲音——淺析盛可以《彌留之際》女性主義敘述的解讀〉，《大眾文藝》2016：1（2016.1），頁 34 等文。其他如大量的學位論文均然。

<sup>79</sup> 盛可以：〈小說需要冒犯的力量（外一篇）〉，《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09：1（2009.2），頁 28。

<sup>80</sup> 盛可以：《北妹》，頁 172。

<sup>81</sup> 盛可以：《北妹·再版後記》，頁 281。

看到她以女性的本能冒犯女性面對城鄉身分、性別身分所受到身體、欲望的種種壓迫。她忠實地聽從著自我的召喚，並且最終堅持留在城市，這就是錢小紅面對生活的堅忍與鬥志。我認為唯有從此層面解讀，才能展示出錢小紅此一鄉土女性內在龐大的原始能量。

如果一如論者所觀察，相較於第一代農民工，那些在改革開放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後）出生和成長並於世紀之交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第二代打工者，正在從焦慮轉向憤怒，從沉默轉向行動，從同意轉向反抗，<sup>82</sup>那麼在盛可以所創造的小說人物身上，我們除了看到蓬勃的生命力和強烈的情欲自主意識外，更看到錢小紅以肉身無畏的坦露作為抗議，甚至以身相殉、與城市罪惡相始終的悲壯氣質，從這個角度看來，錢小紅可謂是為底層邊緣女性發出吶喊的先聲。

## 五、70 後小說中城市異鄉者的歷史脈絡與形象差異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關於「城市異鄉者」進入城市的行動選擇、苦難遭際與心路歷程，文學作品裡每多有描繪。作家意在藉此反映鄉村貧困的實相、社會不公不義及道德觀念所受到的挑戰等。中國自 1980 年代以來面對轉型時期表現城鄉衝突的作品，亦與現代文學史上的「農民進城」主題可相互對照，以下擬進一步探究、觀察此面向。

中國現代農民進城的歷史，可追溯自晚清「洋務運動」時期，<sup>83</sup>逐步發展的城市工業不斷吸納農村人口，在五四現實主義脈絡下的鄉土小說家，描繪了天災人禍等壓力逼迫下的農民對城市所生發的夢想，以及入城後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與剝削。此種不平之氣與左翼文學結合後，階級對立愈發強烈，在作家筆下，工廠、警察、房

<sup>82</sup> 盧暉臨、潘毅：〈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收入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頁 136-137。

<sup>83</sup> 關於描寫中國農民進城的文學歷史脈絡追溯，可參丁帆主編：《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第一章「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頁 25-34；江臘生：《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頁 49-69。

東成為新的階級壓迫力量，「城市」作為他者被嚴厲批判，城鄉關係甚且成為兩個對立階級的拉拒。

如果從現代文學裡所描寫的農村女性進城題材來看，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如葉紹鈞〈這也是一個人？〉（1919）乃是以啟蒙主題，針對女性婚姻、行為缺乏自主權的現象進行批判。小說裡的「她」沒有名字，顯見是女性普遍命運的縮影，「她」在農村只被作為勞動力和傳宗接代的工具，被迫逃走、終於進城後，自立更生為人幫傭，主子認為「如今法律，請求離婚，並不煩難」，奈何城裡人的法律尚不及於農村婦女，「她」最後還是被帶回夫家，人如牲口般「用不著了，便該賣掉」。<sup>84</sup>丁玲創作前期發表的《阿毛姑娘》（1928）則重在表現女性階級觀念蒙昧的覺醒與憧憬。16歲從鄉裡嫁到西湖邊的阿毛，聽人說起上海「簡直像一種神話中的奇境」，<sup>85</sup>到了上海，見識了城市的浮華與太太小姐們的儀態，更興起崇仰之心與虛榮的憧憬，最後因夫家未能滿足她的夢想，遂厭世而尋短。阿毛對階級的覺知與誤解，釀成其由鄉至鎮，而終究未及進城的悲劇。

至於進城的農村婦女，魯迅〈祝福〉裡的祥林嫂算是較早出現在文學史中的女傭形象，其他如前述葉紹鈞小說或王魯彥〈李媽〉裡的女傭，沈從文筆下〈丈夫〉等成為性工作者的湘西婦女，或者蕭紅《生死場》（1934）中的金枝，走在哈爾濱街上，因自己的衣裳和別人不一樣而自卑，因不懂城裡人用詞而受到恥笑，迫於生計，金枝遭到男人誘騙、賣身，而後羞恨返鄉。母親不關注女兒的心情，看到她帶回的兩塊錢，只以為城市居然這麼容易掙錢，還堅持讓金枝回城裡去，<sup>86</sup>凡此都敘寫農村女性的悲哀。草明同樣發表於 1930 年代的〈傾跌〉，也鋪陳了鄉下女孩進城打工的艱辛。上述小說從批判鄉村文化與道德觀對女性的壓抑與束縛，轉向寫女性對城市的憧憬、入城的辛酸。基本上，此類「問題小說」所展露的態度多以魯迅為宗，將啟蒙對象指向社會下層，苦難敘事、底層視角及人道關懷是其特點，情調上則或憤慨、或悲涼。

---

<sup>84</sup> 相關引文見葉紹鈞：〈這也是一個人？〉，《新潮》1：3（1919），頁 469、470。

<sup>85</sup> 丁玲：〈阿毛姑娘〉，《丁玲選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頁 89。

<sup>86</sup> 見蕭紅：《呼蘭河傳·生死場》（臺北：輔新書局，1989），頁 342-355。

到了 1930 年代的左翼文學，除了階級對立主題之外，則另有一批入城女性轉進「革命加戀愛」小說裡，追求理想與人格的成長，文本情調乃一轉為激進而昂揚。左翼思潮強化了女性的反抗意識，至 1940 年代，籠罩於戰爭語境下的鄉土書寫，則繼續維持批判現實主義的發展方向，國統區以吳組緜、沙汀、艾蕪為代表，解放區作家則以趙樹理、丁玲等作家為代表，着力於刻畫戰鬥英雄與生產英雄。1949 年之後，更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設計，鄉下人被戶籍制度、農村集體經濟合作組織等強制性網綁於土地，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裡，因此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農民進城」書寫，少數如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1956）裡的妻子，則同樣以進步昂揚、不為都市所腐化的正面形象，鼓舞、感化了一步步沉淪中的丈夫。

女性由鄉入城的題材，在改革開放之後是否產生變異？新時期作家又如何展演當代版的「上城記」？我以為此後的女性入城題材，確有一脈絡承繼了 1930 年代以來昂揚、明朗的敘事腔調，例如王安憶（1954-）乃中共建政後隨母親遷至上海的一代，她的小說〈民工劉建華〉來自鄉村，卻具有上海人的優雅氣質，整體而言，關於劉建華的城市經歷，乃是在一連串戲劇化的小衝突中，「意趣盎然地表現出普通市民階層對民工的遷就、認同直至主動和解。」<sup>87</sup>至於女性入城的題材，觀察王安憶寫《上種紅菱下種藕》裡的秧寶寶、《月色撩人》裡的提提，也都同樣張著童稚或純真之眼，興致勃勃地觀察著都市及周遭的變化，她們對城市的融入是漸進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雖有評者指出《月色撩人》裡，提提的形象展示了「主體性逐漸消失的脈絡」，<sup>88</sup>也有評者以為《月色撩人》隱見作家對「滾滾錢流的新時代新世界充滿了矛盾的情緒」，<sup>89</sup>但我以為王安憶賦予了「提提」角色充滿能動性的潛質，這個年輕的鄉下女孩具有空洞而又隨時能被充盈的可塑性，懂得如何利用男人對女性的興趣，世故之外又另有一種純情，「一種可以不管不顧的可怕。這是一個鄙俗的生命，唯其鄙俗，

<sup>87</sup> 見江臘生：《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頁 131。

<sup>88</sup> 季奕：〈被形塑的無知者和被改造的闖入者——論王安憶的《月色撩人》〉，《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7：2（2017.12），頁 201。

<sup>89</sup> 柯裕棻：〈物換星移的城市寓言〉，收入王安憶：《月色撩人》（臺北：麥田出版，2008），頁 3。

才強悍有力」。<sup>90</sup>提提的生機與活力，就藏在她的鄙俗和裝腔作勢的有趣裡，小說鋪陳了一無所有的鄉下女孩來到城市的莽撞與好奇，展現了外鄉女孩如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創造出自我選擇和改變的可能性過程。

王安憶小說中的入城女性，之所以承繼左翼文學中的明亮色彩與昂揚情調（雖則「革命」女性的身分已消失），我以為與成長背景有關，亦即其父母於 1950 年代乃是以「幹部」身分入城。但觀察其他 50、60 後作家，例如孫惠芬（1961-）雖為農村出身，當她帶著切身經驗描繪農民進城經歷時，也「走出農民工敘述的悲悲戚戚，而以生存的詩意加以穿透」。<sup>91</sup>觀察其小說〈吉寬的馬車〉，寫吉寬因戀人進城不久即被小老闆相中，為追尋愛情，他辭別家人和馬車進城打工。此後小說不鋪敘男性打工的艱辛，也不著重寫戀人女性入城的受騙經歷，轉而敘述民工發跡，在重拾愛情與返鄉期望之間的抉擇。城市打工圖景、打工者仇視城市等情節，完全不見於其小說中。又如賈平凹（1952-）的《高興》，寫農民劉哈娃為了婚姻大事，將自己的一顆腎賣給城裡人，但房子建成後女人已嫁為他婦，為此他改名劉高興，進城撿破爛維生，希望自己像那顆腎一樣在城裡落戶。農民進城的話題，在小說中被演繹成高興與不高興的情緒問題，賈平凹強化農民對城市的認同，被評者以為有「暗合主流意識型態的意圖。農民工在城市的高興，意味著城鄉之間能夠和諧。」<sup>92</sup>如此樂觀的想法固然有可議之處，然而由此亦不難體現，50、60 後作家對於農民進城的觀察，或因文革成長背景或因意識形態使然，基本上傾向於 1930 年代以來，左翼文學及其後社會主義思維下對農民書寫的樂觀與讚頌。

相較於 50、60 後作家小說裡的明朗色彩，我以為 70 後小說家在鋪陳類似題材時，則顯然較多承繼了中國現代小說裡另一條五四以來的「問題小說」書寫脈絡，即偏重描繪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漂泊，情調上也傾向於前述魯迅、葉紹鈞、丁玲等人較為陰鬱、壓抑的控訴或悲情書寫。這樣的書寫傾向有個人成長及受教背景因

---

<sup>90</sup> 王安憶：《月色撩人》，頁 104-105。

<sup>91</sup> 江臘生：《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頁 166。

<sup>92</sup> 江臘生：《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頁 180。

素，<sup>93</sup>也有時代政策變遷之跡。從廣闊的社會原因觀察，改革開放以來身分認同的實際差異與危機的生發，是這批作品出現的集體性原因，一如論者所分析，農民的身分不是天生的，而是以國家權力為保障的制度性安排，上一輩對城鄉世襲的身分採取被動性認同，但新生代的農村青年則拒絕認同，<sup>94</sup>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下，他們背棄了農村，又成為城市棄兒，由此陷入身分的焦慮與認同危機。

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所刻畫的女性入城困境，與中國 1920 年代的問題小說，當然有時代差別下的變異，畢竟五四時期的氛圍重在農民啟蒙視角；70 後出生一輩所書寫的問題重點，則在於國家政策影響下身分難以改變的困境。然而觀察其中對於入城女性命運的書寫，則有處境類同之重返，也有新時代生發的問題表述。首先，就對農村的描寫與離鄉驅動力的分析而言，可以看到當前農村的困境除了破敗貧窮之外，更嚴重的其實是人心／人性的變化，過往鄉土小說裡所歌頌的和諧與寧靜、鄉民淳樸善良的品質等，固然仍存在於付秀瑩的芳村、魯敏的東壩系列小說裡，但價值觀的衝擊、鄉土社會裡情與法取捨的偏移等，也都深刻進入了作家的觀察視野。尤其在這批入城小說裡，人性的冷酷、自私與家長里短的流言蜚語，更是迫使女性逃離的動力，鄉村女性汲汲於追求的，是希望藉由婚姻關係擺脫留在農村的宿命；若不然，則以身體換取經濟資源，亦是不得不的選擇。

如果以為這是小說對現實處境的誇大化處理，則我們可進一步由中國農村的社會調查報告中，看到小說對現實洞察之犀利，2013 年以來，中國農民工的問題較諸新世紀初已更為嚴重，回不去的農村則從生態環境到精神狀態都大幅淪落，村民彼此間缺乏同情心，人際關係惡化，一如魏微等人的小說中所曾描述。至於男生做鄉

<sup>93</sup> 例如以盛可以而言，失愛與失學的個人生命歷程，常反映在她的小說中，形成女性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曾有論者分析其畫作，指出她「畫的是童年的孤獨與愛，也可說是此時的絕望與傷；是緬懷逝去的故鄉，也是哀悼現實的境況。」余幼幼：〈盛可以：讓人迷戀，亦讓人生病〉，《青年作家》2016：8（2016.8），頁 10。而在小說裡，我們可以讀到《時間少女》中西西對於愛情與親情的尋找，最終雙重失落。《北妹》裡失愛的錢小紅因朱大常「陌生而親切，微小卻深重」（《北妹》，頁 79）的關心而感動，以及她思鄉卻不得歸的窘境。錢小紅的原型是家鄉人物，作者把她「放到廣闊的社會中去」（《北妹·後記》，頁 280），其中應該也有自身的投影。

<sup>94</sup> 參見丁帆主編：《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第一章「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頁 35-37。

村痞子、女生外出賣春的情況，如盛可以小說中所描繪者，更是屢見不鮮。對不少農村女孩來說，「賣」已經沒有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sup>95</sup>農村問題的惡化實遠超過人們想像。

其次，流動性匱乏是當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關於貧富懸殊、社會底層龐大等問題，早在蔡翔於 1996 年寫就的〈底層〉一文裡即有所反省，其後他更反覆提示階級間的流動性是現代社會的特徵，流動性使「改變」成為一種社會承諾，甚至誇大為一種文化神話，因為能真正改變自己的畢竟是少數。他並指出「整個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在拼命強調『成功』，但是下層又不具有『成功』的任何資源」。<sup>96</sup>石一楓（1979-）中篇〈世間已無陳金芳〉，寫「我」的同學陳金芳自小因來自底層而備受歧視，成年後搖身一變躋身名流圈，並改名陳予倩，但最後還是難逃身敗名裂的命運。此篇小說裡所塑造的陳金芳，正是相信承諾，卻又無法逃脫嚴密分層制度的悲劇性人物。其他如失學、貧窮也是盛可以小說裡常見到的女性處境，求學、婚姻則是農村女性脫離宿命的唯二管道，但政治規範、經濟邏輯與教育資源不均等多重社會不公，早已使上升通道嚴重受阻。學者提示「中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社會經濟的重新分化，但分化的社會隔離還在進一步固化」，<sup>97</sup>這些也都是小說對於現實社會真實的反映與提醒。

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雖然相較於 1920 年代以來小說裡的入城女性或被遣回農村賣掉、或無法進城而鬱鬱以終之命運，當代小說裡的農村女性顯然是更有行動力與自由生產力的，然而，女性進城後的命運卻相彷彿，她們所能從事的仍以女傭、工人、妓女等辛勞與屈辱的職業為多，婚姻與性仍是女性翻身的指望，女性命運是否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職業受限的因素為何？凡此與社會結構及底層的固着性實息息相關。

最後，相較於王安憶小說裡女性對於城市的張望與好奇，70 後小說家則較多銜接了 1920 年代以來問題小說的批判脈絡，對於城市底層女性有更多血淋淋的注目。

---

<sup>95</sup> 參見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新北：八旗文化，2017），頁 200-210。

<sup>96</sup> 蔡翔、劉旭：〈底層問題與知識份子的使命〉，《天涯》2004：3（2004.3），頁 10。

<sup>97</sup> 王豐著，馬磊譯：《分割與分層：改革時期中國城市的不平等·中譯版作者序》，頁 3。

「底層」一詞源自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而受其影響的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在〈從屬階級能發言嗎？〉<sup>98</sup>（“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則提出底層人民概念既可指涉因無法享受教育資源而被排除於主流知識體系的以外的農民、原住民，也可以指涉缺乏敘事權的女性、被殖民者。<sup>99</sup>史碧娃克在文中擴大探討了社會下層人能不能為他或她自己說話，還是注定只能以必然扭曲或「有利害關係」的方式被認知、再現與代言。<sup>100</sup>而在 70 後這批由鄉入城女性命運的書寫隊伍中，有被視為打工作家如盛可以者，亦有被視為菁英作家如魏微、付秀瑩、石一楓等；至於在描寫人物方面，則可以看到範疇廣及中學教師、白領階級、女傭、髮廊妹等。一如史碧娃克所指出，由於女性被種種異質環境消音，女性也可以說是底層人民，<sup>101</sup>這些作家對於被排除或邊緣化女性的書寫與表述，正意味著立場和態度上對主流的解構與批判，女性以肉身書寫企圖說話，其中也隱含了批判精神與革命力量是否可能萌動的期待。從此角度看來，這批女性進城小說一方面揭露了制度的非正當性，另一方面也探討了歧視的制度性根源，它們對於農民工尊嚴的認同以及無聲的抗議，因此更具有一種穿透文本的力量。

## 六、結語：一代人的創業史與心靈史<sup>102</sup>

學者曾提示，從「鉅變」的角度來看待當今中國社會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其

<sup>98</sup> 〔印〕Gayatri C. Spivak 著，邱彥彬、李翠芬譯：〈從屬階級能發言嗎？〉，《中外文學》24：6（1995.11），頁 94-123。

<sup>99</sup> 參見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275。

<sup>100</sup> 〔英〕巴特·摩爾-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著，彭淮棟譯：《後殖民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141。

<sup>101</sup> 參見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頁 275。

<sup>102</sup> 此處借用朱山坡語，他在座談中指出進城文學既是「新的創業史，也是一代人的心靈史」。見陳倉、葛水平、李浩、付秀瑩、喬葉、石一楓、梁鴻、黃孝陽、朱山坡、弋舟、大解：〈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文學到底何為？〉，《江南》2017：6（2017.6），頁 123。

所產生的變化絕不限於社會生活細微末節的改變，而是整個社會的生計模式、基本的社會安排和社會框架以及階級、階層結構都在發生變化和進行重構。<sup>103</sup>從此角度而言，我以為石一楓在〈世間已無陳金芳〉裡創造的角色，微觀而言，固然可視為無法逃脫分層制度的典型入城女性；宏觀來看，或也可視為中國社會發展狀態的縮影，小說裡的陳金芳在階級爬升過程中，過於著急、賭性太大，生命階段也因此判然割裂，作者或許意在藉此人物表現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種種粗暴的巧取豪奪所可能產生的危機，並從中寄寓他對進入全球化社會的檢討。

中國學者在討論底層問題時，也曾警惕如果現代化的發展在於犧牲大部分人的利益，那麼，這種發展道路一定有問題。<sup>104</sup>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 70 後作家以其成長歷程中所見所感，疊合組構出入城女性艱難的奮鬥歷程，並以其對人性的洞察與悲憫，賦予筆下人物更為珍貴的反抗意識與精神特質，一如盛可以所自許：

寫出人性的多種可能性，寫出隱晦的真相，寫出個人對社會、對時代、對人類的洞察與標識，這才是最重要的，才應該是真正的主流。<sup>105</sup>

凡此在虛構中呈現實有，以表徵指涉真相，<sup>106</sup>藉由女性細微的生活細節，去體現整個社會結構大問題，並做出分析、判斷及針砭的作品，都是作家以銳利之眼，對當代中國正在變幻的社會現實所進行的觀察與再現，這批進城者都是「在自己祖國土地上的異鄉人」，<sup>107</sup>小說不僅展示出一代女性的精神和情感圖景，也由此形成時代經驗的隱喻。

又有作家質疑此波鄉土寫作熱潮，可能與當今提倡「接地氣」的底層寫作、特別重視講一個好故事，以及故事應承載社會意義等中國官方政策影響有關。<sup>108</sup>然而

<sup>103</sup> 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收入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頁 29。

<sup>104</sup> 蔡翔、劉旭：〈底層問題與知識份子的使命〉，頁 12。

<sup>105</sup> 肖瑩：〈盛可以：好的作品，自己會走路〉，《天津中學生》2013：Z1（2013.2），頁 9。

<sup>106</sup> 曹霞：〈閃電在深淵裡的舞蹈——盛可以論〉，頁 78。

<sup>107</sup> 此為吳介民語，見〈推薦序 中國奇蹟背後的犧牲者〉，收入〔美〕羅谷著，廖世德譯：《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頁 5。

<sup>108</sup> 章緣：〈5·6 月駐版作家章緣答客問·生活就是寫作最大的本錢〉，《聯合報·副刊》，2017 年 6 月 18 日。

經由以上觀察與討論，可以發現這些表現中國城鄉流動狀態的小說，無論是否隱然與「接地氣」的指令相唱和，作家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講述了另類的「中國故事」。小說讓我們看到中國巨型城市作為「世界工廠」光鮮外表下的隱憂，城鄉、貧富、階級、性別，多重的限制始終桎梏著在城鄉流動中掙扎奮鬥的女性，中國的階級層構並未曾如社會主義理想般有所改變。而文學對現實所做的提煉與呈現，卻也正是對所謂「中國奇蹟」神話最有力的搏擊。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丁玲：《丁玲選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
- 王安憶：《月色撩人》，臺北：麥田出版，2008。
- \* 付秀瑩：《他鄉》，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 \* 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臺北：人間出版社，2016。
- 徐則臣：《啊，北京·我們在北京相遇》，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
- 盛可以：《火宅》，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
- 盛可以：《取暖運動》，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
- \* 盛可以：《北妹》，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 盛可以：《可以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
- 盛可以：《野蠻生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
- \* 盛可以：《時間少女》，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
- \* 盛可以：《水乳》，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
- \* 盛可以：《女傭手記》，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
- 葉紹鈞：〈這也是一個人？〉，《新潮》1：3（1919），頁 467-470。
-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輔新書局，1989。
- \* 魏微：《姐姐和弟弟》，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 二、近人論著

- 丁帆主編：《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 王秀濤：〈情感的力量——讀付秀瑩長篇小說《他鄉》〉，《當代作家評論》2020：2（2020.3），頁 61-65。
- 王春光：〈城鄉結構：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遲滯者〉，《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4：1（2007.3），頁 46-57。
- \* 王豐著，馬磊譯：《分割與分層：改革時期中國城市的不平等》，杭州：浙江人民

- 出版社，2013。
- 付明根：〈雙重疏離：從〈異鄉〉看當代人返鄉的精神歷程〉，《文藝評論》2012：1（2012.1），頁 98-102。
- 申霞艷：〈誘惑的天賦——盛可以論〉，《文藝爭鳴》2018：6（2018.6），頁 135-143。
- 石曉楓：〈假做真時：徐則臣北京系列小說中的偽證／偽貨販售者〉，中國《文藝報》第 9 版，2017 年 5 月 17 日。
- 向華麗：〈女性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於湖北 3 市的調查〉，《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3：1（2013.1），頁 103-110。
- 江臘生：《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新北：八旗文化，2017。
- 何曉紅：〈一個女性農民工的 30 年進城打工生活史——基於生命歷程理論研究的視角〉，《中國青年研究》5（2011.5），頁 37-41。
- 余幼幼：〈盛可以：讓人迷戀，亦讓人生病〉，《青年作家》2016：8（2016.8），頁 6-13。
- 吳聖剛：〈文明與墮落——關於魏微〈異鄉〉所引發的問題〉，《名作欣賞》2006：9（2006.5），頁 47-61。
- 呂濤亞：〈都是異鄉人〉，《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9（2009.9），頁 65。
- 李丹夢：〈文學「返鄉」之路——魏微論〉，《山花》2008：1（2008.1），頁 147-154。
- 李雲雷：〈「中國故事」的獨特魅力——付秀瑩小說創作論〉，《百家評論》2014：1（2014.2），頁 115-118。
- 肖瑩：〈盛可以：好的作品，自己會走路〉，《天津中學生》2013：Z1（2013.2），頁 8-9。
- 周婷：〈新世紀女性寫作的異質性——盛可以小說創作〉，《小說評論》2013：S2（2013.10），頁 38-40。
- 周婷：〈盛可以以「冒犯之筆」穿越生活的殘酷真相〉，《短篇小說（原創版）》2014：14（2014.5），頁 31-32。

- 孟繁華：〈當下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從石一楓的小說創作看當下文學的新變〉，《文學評論》4（2017.7），頁 174-186。
- 季奕：〈被形塑的無知者和被改造的闖入者——論王安憶的《月色撩人》〉，《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7：2（2017.12），頁 197-206。
- 侯雅倩：《論付秀瑩小說的城鄉書寫》，遼寧：遼寧師範大學中國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21。
- 夏琪報導：〈葉煒：當下中國需要一種「新鄉土寫作」〉，《中華讀書報》第 7 版，2015 年 8 月 26 日。
- 荊瑩瑩：〈雙重人格意識下的女性主義敘述聲音——淺析盛可以《彌留之際》女性主義敘述的解讀〉，《大眾文藝》2016：1（2016.1），頁 34。
- 馬玲麗：〈身體自由：欲望與反抗的雙重沉淪——以盛可以的《北妹》為例反觀當下底層女性文學寫作〉，《名作欣賞》2010：15（2010.5），頁 34-36。
- 張蓓：〈女性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現象研究〉，《南京財經大學學報》155（2009.2），頁 103-105。
- 曹霞：〈閃電在深淵裡的舞蹈——盛可以論〉，《藝術廣角》2019：6（2019.11），頁 71-80。
- 盛可以：〈小說需要冒犯的力量（外一篇）〉，《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09：1（2009.2），頁 28-29。
- 章緣：〈5·6 月駐版作家章緣答客問·生活就是寫作最大的本錢〉，《聯合報·副刊》，2017 年 6 月 18 日。
- 陳昭瑛：〈霸權與典律：葛蘭西的文化理論〉，《中外文學》21：2（1992.7），頁 54-92。
- 陳倉、葛水平、李浩、付秀瑩、喬葉、石一楓、梁鴻、黃孝陽、朱山坡、弋舟、大解：〈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文學到底何為？〉，《江南》2017：6（2017.6），頁 111-125。
-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遲來的後

- 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269-306。
- 劉濤：〈書寫人倫之正——付秀瑩論〉，《西湖》2012：6（2012.6），頁 104-107。
- \* 潘毅、孟捷等：《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
- 蔡翔、劉旭：〈底層問題與知識份子的使命〉，《天涯》2004：3（2004.3），頁 4-14。
- 鄭周明：〈付秀瑩：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都身在「他鄉」〉，《文學報》第 3 版，2019 年 8 月 15 日。
- 〔印〕Gayatri C. Spivak 著，邱彥彬、李翠芬譯：〈從屬階級能發言嗎？〉，《中外文學》24：6（1995.11），頁 94-123。
- \* 〔美〕羅谷（Dexter Roberts）著，廖世德譯：《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新北：八旗文化，2021。
- 〔英〕巴特·摩爾-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著，彭淮棟譯：《後殖民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 \* 〔英〕唐米樂（Tom Miller）著，譚天譯：《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臺北：麥田出版，2014。
- Gramsci, Antonio. "Types of Periodical: The Final Evolutionary Being." I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Forgacs,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translated by William Boelhower, 402.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 Gramsci, Antonio. "Men or Machines?" In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edited by David Forgacs, 62-63.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exter Roberts, trans. by Liao Shi De, *Di Duan Zhong Guo: Dang, Tu Di, Nong Min Gong, Yu Zhong Guo Ji Jiang Dao Lai De Jing Ji Wei Ji* [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aipei: Gusa Press, 2021).
- Fu Xiu Ying, *Ta Xiang* [Far Away From Home]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9).
- Pan Yi, Meng Jie, et. al, *Nong Min Gong Yu Xin Gong Ren: Dang Dai Zhong Guo Jie Ji Wen Ti Yan Jiu*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On Contemporary Class Issues in China] (Hsinch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 Sheng Ke Yi, *Bei Mei* [Northern Girl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Sheng Ke Yi, *Shi Jian Shao Nv* [Time Girl]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 Sheng Ke Yi, *Shui Ru* [Water Emulsion]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 Sheng Ke Yi, *Nu Yong Shou Ji* [Maid's Diary]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0).
- Shi Yi Feng, *Shi Jian Yi Wu Chen Jin Fang* [There is No Chen Jin Fang in the World] (Taipei: Ren Jia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Tom Miller, trans. by Tan Tian, *Shi Yi Min Gong Jin Cheng Lai: Shi Shang Zui Da Gui Mo Ren Kou Qian Xi Ru He Gai Zao Zhong Guo?* [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2014).
- Wang Feng, trans. by Ma Lei, *Fen Ge Yu Fen Ceng: Gai Ge Shi Qi Zhong Guo Cheng Shi De Bu Ping Deng* [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Wei Wei, *Jie Jie Yu Di Di* [Sister and Brother] (Jinan: Shando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05).

